

MAO ZE DONG



★ ★ ★ ★ ★
毛 泽 东

主编：柯 延

生平全纪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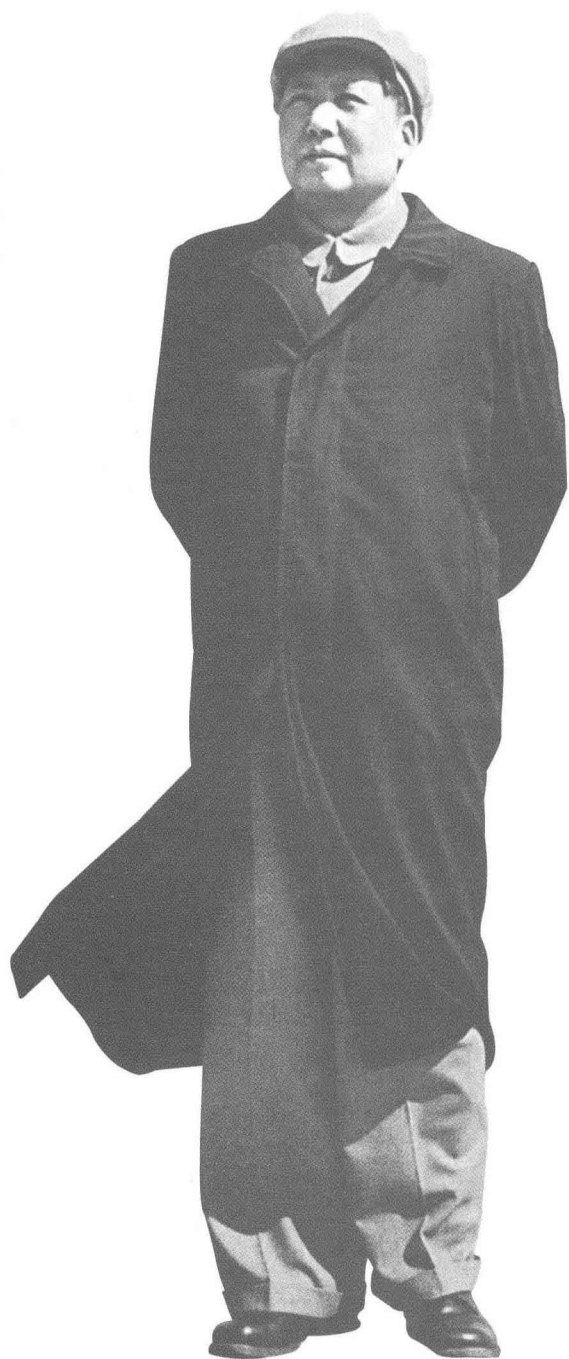
中央文献出版社

毛泽东生平全纪录

主编◎柯延

中央文献出版社

中









毛泽东

生·平·全·纪·录

第三章 Chapter 03

烽火岁月逞英豪

抗大是一块磨刀石

1936年10月下旬，我（指何长工）来到了中国抗日红军大学学习。结业后，又参加了第二期学习。1937年1月20日第二期在延安开学。第二期接受了新的任务，在培养训练红军干部之外，还要培养从外地来延安的知识青年，为革命培养更多的抗日军政干部。对红军干部的培养也更扩大了。二、四方面军会师陕北，一大批干部成了第二期的学员。为适应这一新的形势，学校迁往延安，改名为“中国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这一期共编4个大队，学员共2763人。

开学那天，毛泽东参加了开学典礼，并做了重要讲话。他说：“抗大是一块磨刀石，把那些小资产阶级的意识——感情冲动、粗暴浮躁、没有耐心等等，磨它个精光；把自己变成一把雪亮的利刃，去革新社会，去打倒日本。”开学不久，学校成立了以毛泽东为主席的教育委员会，政治部、训练部也先后建立起来。特别有意义的是毛泽东第一次提出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作为抗大的教育方针，规定了“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风。它为抗大的建设和后来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奠定了基础。从此，抗大以崭新的战斗姿态，开始有计划、有目的、有成效地培养造就着一代抗日人才。



中国抗日军政大学五边会的校址



革命熔炉

抗大，是革命熔炉。这句话是我到延安后听到毛泽东说的。抗大的学员，尽管来自四面八方，但他们都有1个共同的心愿，就是要在抗大这座革命熔炉里脱胎换骨，百炼成钢，把自己锻炼成坚强的抗日先锋战士。因此，用熔炉火旺来形容它是再合适也没有的了。

建校初期，王明从极“左”跳到极右，公然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三民主义是抗大的重要课程”。毛泽东反对王明这种主张。他再三强调，抗大不是统一战线的学校，而是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的干部学校。在毛泽东教育下，广大干部、学员有力地抵制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干扰破坏，坚持了抗大的正确的政治方向。

马恩列斯和毛泽东的著作，以及党中央的重要决议、政策，是抗大的基本教材。1937年3月，党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做出《张国焘错误的决定》后，立即在抗大贯彻，号召一、二、四方面军干部紧紧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同张国焘的错误路线划清界限。党中央和毛泽东系统分析了张国焘错误的性质、内容、根源、危害，并明确指出：南下逃跑和另立中央由张国焘一人负责，其他同志一律不负责任；批判张国焘路线是教育同志，不准整人，更不准搞狭隘的宗派主义。广大学员在



毛泽东

生·平·全·纪·录



这场斗争中上了一堂生动的路线教育课。受张国焘路线影响的同志也认清了这条错误路线的实质和危害，后来为革命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青年学生中，存在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阶级观念不明确。抗大以阶级教育作为一门重要课程，用《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做教材，结合中国阶级斗争的现状教育学员。教员向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做调查，讲课中用大量阶级斗争的生动事例，讲述阶级的存在和区分，引起学员的热烈反响。同学们讨论农民和地主、工人和资本家“谁养活谁”的问题时，联系实际，各抒己见。通过争辩，得出了共同结论：深山里没有不吃人的豺狼，社会上没有不喝工农血汗的地主、资本家。地主、资本家是靠剥削起家的。阶级教育像春风化雨，滋润着学员的心田。他们决心抛弃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感情，站在广大劳动人民一边，“俯首甘为孺子牛”，为工农的解放事业而奋斗。

理论联系实际

抗大，是在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关怀下成长壮大起来的新型学校。党中央领导同志经常来学校讲课或作报告。毛泽东对抗大的教育极为重视，除了参加决定学校的重大问题，还经常亲临学校讲课。学校还在保安时，为了使学员树立抗日的信心和认清抗日救国的出路，毛泽东专门讲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后来这篇著作成为抗大的基本政治教材；为了使学员了解第



·毛泽东在抗日军政大学发表演讲。
·1937年春，毛泽东、朱德等和抗大部分人员合影。（左图）



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内军事上的两条路线斗争，加深对无产阶级军事思想的理解，积极投入民族解放战争，毛泽东亲自讲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讲课以前，每天晚上他都在窑洞前的大树下，挂起马灯，请来学员、干部了解情况，一直到深夜。讲课时，他引用大量事实说明问题，分析得条条在理，生动活泼，大家越听越爱听。为了回答干部、学员提出的问题，他经常到深夜摸黑从学校走路回去。一次讲课中，毛泽东讲到对问题要多加分析和研究时，他说：我们有的指挥员对情况缺乏研究，别人一鼓励就来了劲，结果事与愿违，成了1个鲁莽家。当毛泽东说到：“我们不许可任何1个红军指挥员变为乱撞乱碰的鲁莽家；我们必须提倡每个红军指挥员变为勇敢而明智的英雄”时，有个学员越听越感到毛泽东讲的像自己，是自己经过的事，于是，这个学员没等主席讲完课，就站起来说：主席讲的是我，今后我一定克服鲁莽的毛病。接着又有几个学员说：不！主席讲的是我。从此，“不当鲁莽家，要做勇敢而明智的英雄”成了大家的座右铭。



毛泽东

生·平·全·纪·录

· 1939年6月1日，抗大举行建校纪念大会，毛泽东等在会上检阅学员队伍



毛泽东讲课十分重视理论联系实际，特别是联系当前政治斗争、阶级斗争的实际，用简明的语言、生动的事例解决大家的思想问题。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抓住了蒋介石，我党派周恩来副主席前往西安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当时，许多学员一时不理解党中央这个决定。为了阐明党中央这一决定的重要意义，讲课中，毛泽东讲了1个“毛驴上山”的故事。毛泽东说：陕北毛驴很多，让毛驴上山有三个办法，一拉、二推、三打。蒋介石是不愿意抗战的，我们就采取对付毛驴的办法，拉他、推他，再不干就打他。西安事变就是这样。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抗战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起决定作用的是我们，国共合作是大势所趋。但是，驴子会踢人的，我们又要提防他，这就是又要联合又要斗争。

1937年，毛泽东在延安凤凰山麓居住时，还抽出时间为抗大学员讲授《实践论》和《矛盾论》。从4月份一直讲到“七七”事变，共讲了100多个小时，从而使学员懂得了必须掌握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努力克服教条主义的重大意义。

来抗大学习的爱国青年，都有着抗战热情高的特点。但是由于这些青年来自社会的各个阶层，他们的生活环境、所处地位各不相同。因此，革命觉悟就不同，对抗战的重大的基本问题，以及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等认识就有极大的差异。当时社会上失败主义的亡国论者跑出来向人们



散布说：中国会亡，最后胜利不是中国的。某些性急的朋友也在人们中传播：中国很快就能战胜，无须乎费大气力。这两种错误思想影响着抗大青年，妨碍他们正确地认识抗日的形势。1938年5月，在抗日战争研究会上，毛泽东讲演了《论持久战》，驳斥了种种谬论。他精辟地分析了敌人是帝国主义强国，我们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国；但我们是“大国、进步、多助”，敌人是“小国、退步、寡助”的本质。指出了抗战是持久的，而必须经历“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的三个阶段，“最后胜利是中国的”。这一伟大战略思想极大地鼓舞着抗大的学员。通过认真学习，学员们领会了这一战略思想的伟大意义，批判了“亡国论”和“速胜论”，提高了认识，并组织宣传队到地方宣传群众。当时延安连娃娃都能扳着指头说着抗战三个阶段：防御、相持、大反攻。

毛泽东一贯倡导学校教学方法要用“启发式”、“研究式”、“实验式”。后来他回忆抗大教学方法时曾说过：“我过去在抗大讲课的时候，就要把讲稿发给学员，我只讲30分钟，让学员自己去研究，然后提出问题，教员解答。”这样，本来一些深奥的哲学原理，经过他这么一讲，就非常浅显易懂。每当他讲到一些生动的例证时，听课的老同志笑了，新同志笑了，炊事员也笑了。一把钥匙开了千把锁。

延安窑洞有马列主义

在红军由游击战发展到运动战初期，有一位王明路线的积极拥护者一进江西，就在反“围剿”问题上和毛主席争论。第二次反“围剿”横扫700里的辉煌胜利，本已证明他是错了的，然而他不但不错，还给毛主席送上一顶“狭隘经验论”的大帽子。毛主席后来偶然提到说：“我因此，到延安就发愤读书。”我看到毛主席的确在想方设法搜集已译成中文的马列主义的书，挤出时间，不分昼夜，发愤攻读，特别是发愤学哲学。毛主席在青少年时代喜爱学习历史和地理，特别是历代改朝换代的战争和著名的战役，研究农民战争的胜败得失。听说他还读过《读史方輿记要》。诸子百家中各种政治、哲学著作，他也翻阅不少，可算是博学的青年。十月革命以后，他开始努力学习马列主义，虽然当时这方面的书很缺乏，可是他学习的毅力和恒心，学习的方法正确和善于联系实际、善于思考，他的领悟力、记忆力和批判吸收的能力，都比一般人强。在建党初期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那坚定的立场，斗争的勇气，正确的观点方法，在辩论问题中有说服力的逻辑，他的政治水平和政治活动力，当时在党内就是很杰出的。当王明路线的热烈拥护者抛出“狭隘经验主义”的帽子时候，周以栗（原长江局军事部长，奉长江局之命来劝说毛主席再回去打长沙，经毛主席通宵恳谈后，转变了思想，完全拥护毛主席）就站出来说：“山沟里有马克思主义。”横眉冷对王明路线拥护者的围攻。陈毅“七大”前，同毛主席交谈过井冈山斗争问题，谈后找到我（指郭化若），告诉我交谈的大略和他向毛主席提的意见，说：井冈山斗争问题我已同毛主席谈清楚了。“毛主席的唯物论辩证法思想，早在井冈山时期，就已基本建立了1个初步完整的体系，以后则是进一步发展和提高。”历史的实际正像陈毅所说的那样，当时毛主席已牢牢掌握马



毛泽东

生 · 平 · 全 · 纪 · 录

· 1939年，毛泽东在抗大成立3周年纪念大会上讲话。





列主义最根本的原则，强调阶级分析，社会调查，重视贫雇农在革命中的作用，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明确指出红军战争时期敌强我弱、敌众我寡的特点。毛主席和朱德都一再强调，我们只有这一点点本钱，不能丝毫大意，不能打就走。毛主席又善于具体分析具体的矛盾，他多谋善断，善于在客观条件许可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敢于在战略上藐视敌人。上井冈山时毛主席率领的工农革命军只不过千余人。毛、朱会师树起红军第四军大旗时，合起来不过3000余人。转入运动战初期，红军主力也不过30000余人。面对数十倍于我的敌人，经过20余年艰难惊险，几经曲折的奋战，终于取得长征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毛主席对战争的领导，对战役的设计和指挥，总是出敌意外，真可谓妙计神兵。如果没有一条坚强的马列主义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正确领导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就很难想像这一伟大胜利的取得。人们多说中国革命经过长期的艰苦曲折的战争，依我看从全世界各国革命的历程看，中国革命的经历，还算是顺利的。虽然这样，毛主席并不自满，他到延安后，确是发愤读书，首先是发愤读哲学书。要领导中国这样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的国家的革命，得有高度的马列主义的理论不可，得有真正的马列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不可。

当时，全国一些进步的名流学者不辞千里跋涉，历尽重重险阻，来到延安访问，毛主席都一一接见，亲切恳谈，时间多安排在夜间，一谈就谈到深夜，甚至通宵，客人还舍不得告别，毛主席也畅谈不倦。毛主席尊重一切进步的来访的学者，特别尊重自愿过艰苦生活留在延安工作的哲学家及其他作家，艾思奇就是其中的1个。毛主席很尊重艾思奇。我有不了解的哲学问题向毛主席请示，他叫我去找艾思奇谈。我由此认识了艾思奇，第一次他给我的印象是真诚、朴素、直爽。我当时刚开始学哲学，所以提的问题，只不过是哲学字面上的问题。毛主席不但尊重艾思奇和他有来往，也尊重其他哲学家。如何思敬，毛主席就多次请他到自己家里交谈。对李达寄来的《社会学大纲》，毛主席很高兴地读了10遍，并去信要李达再寄10本来，又叫武汉办事处派人和他联系，劝他仍留武汉工作。解放战争大局已定时，毛主席特别托人请李达来参加第一次政协，也请了艾思奇、何思敬，使他们都参加了建国盛典。“陕北公学”请毛主席讲哲学，毛主席费了四个夜晚和三个白天的时间准备了一次的讲课。他把讲课看做是学习的一种方法，认为讲课可以加深学习和记忆，讲一次课比看几回书都更能记忆得清楚。事后谈起，他曾诙谐地说：“我折本了，准备了三天四夜，只讲半天就讲完了。”他讲课讲得深刻而通俗，生动而有趣，使得听课的学生，不断发出笑声，有时甚至哄堂大笑。毛主席认为教学的方法很值得研究，很需要改善。他又应“抗日军政大学”的请求，向红军老干部讲哲学，总政治部宣传部派人做了记录。可惜当时我还在庆阳，未能听到。幸好总政宣传部的记录稿整理后送毛主席审查，略加修改批准打印出来，我才得事后幸福地阅读到。

这个哲学讲授记录稿，一开始就讲哲学中唯心论与唯物论的两军对战，分析唯心论与唯物论的区别和它们发生与发展的根源。接着讲辩证唯物论，指出辩证唯物论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武器，强调对于指导革命运动的干部人员，尤属必修的科目；指出辩证唯物论继承了过去文化之科学的遗产，同时又给此种遗产以革命的改造，形成了一种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最正确、最革命和最完备的哲学的科学。在这一章里毛主席详细地分别阐述了：唯物论、运动论（发展论）、时空论、意识论、反映论、真理论和实践论，接着讲唯物辩证法。可惜讲义稿打印出的只有“矛盾统一的法



毛泽东

生·平·全·纪·录



· 陕北公学学员举行抗日集会。

则”一节,后面就没有了。是毛主席因工作忙只讲到这里呢?还是初审时认为先只整理到这里呢?我当时没有搞清楚。但讲义中在唯物论辩证法这一章开头列举了:质量互变法则,否定之否定法则,以及辩证法诸范畴,本质与现象,形式与内容,原因与结果,根据与条件,可能与现实,偶然与必然,必然与自然,链与环,等等。他说:这些范畴有些是形而上学和唯心论研究过了的,有些则是马克思主义新提出的,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揭去过去形而上学和唯心论的外衣,克服其片面性……大大丰富了它们的内容,成为革命的科学方法论中重要成分,同上述根本范畴联合在一起,就形成1个完整的深刻的唯物辩证法的系统。可以推想当时毛主席是准备全讲的,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没有这样做了。毛主席在审定《毛泽东选集》时,只整理了唯物论中的《实践论》和唯物辩证法中“矛盾对立法则”,改称《矛盾论》。收入《毛泽东选集》中的《实践论》和讲课时的记录稿,基本上没有什么大的改动,只在一些数字上、举例上、解说上,做些文字的修改。至于《矛盾论》则比原来讲课记录稿,有较大的修改,主要删去的是第二节中“形式论理的同一律与辩证法的矛盾律”,其中包括对“同一律”、“矛盾律”和“排中律”的解释和批判;还有一些不很重要的举例和解释也被删去。但主要思想,段落安排(除上述一节外)则都完全按讲课的内容保留下来。增加的地方,主要是在“矛盾的特殊性”一节中,做了较多较深刻的阐述。对“主要矛盾与主要的矛盾方面”、“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则有增加的,也有删削了的。经过修改,不但保全了原来的精神面貌,而且在内容上、逻辑上,都大有发展和提高,光彩倍增,令人景仰。今天,当我们重读上述哲学著作时,可以看到《实践论》发展了“反映论”,《矛盾论》提出了“辩证法的



宇宙观”，并且系统地精辟地阐述了对立统一规律，指出它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法则”。照列宁的说法，这是辩证法的本质和核心。《矛盾论》中许多精辟的论述，对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具有指导意义。许多哲学命题，可说是马列主义唯物辩证法的新发展，是至今为止的哲学界所未曾提出过的。

会见白求恩

1938年春天的1个深夜，料峭的山风还透出一些寒意。大地已熟睡了，但在中国革命圣地延安的杨家岭，很多窑洞依然闪着灯光，其中1个小窑洞里还传出打字机轻快的嗒嗒声，乳白色的道林纸上打印着一串串清晰的英文。办公桌前，一位身穿八路军制服的外国人正在记下这天的日记：

这个远渡重洋来到延安的外国人，就是中国人民的伟大朋友、我们都熟知和爱戴的诺尔曼·白求恩。

这个远渡重洋来到延安的外国人，就是中国人民的伟大朋友、我们都熟知和爱戴的诺尔曼·白求恩。

白求恩刚刚幸福地见到了中国人民的革命领袖毛泽东。白求恩太兴奋了，会见一结束，他就急忙赶回自己窑洞的打字机前，要把谈话的详细经过记录下来，保存下去。

白求恩是一位著名的胸外科专家，他作为加拿大的一名共产党员，参加过国内工人反对资本家的罢工斗争，参加过西班牙反法西斯的民族解放战争。当“七七”卢沟桥事变的消息震动世界，日本开始了全面侵华战争后，他立刻产生了1个强烈的想法，“战斗中、革命中的中国是最迫切需要我的地方，那儿是我最能够发挥作用的地方。”

早在来华之前，白求恩就被中国的革命深深地打动了。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史沫特莱的《红军在长征》等书籍告诉了他，在东方那块古老的土地上发生的事情。而当他在历经了旅途中的风尘和战火的一次次洗礼，摆脱了国民党军政人员的庸俗纠缠之后，终于到达了革命圣地——延安时，他觉得自己的心在这块土地上跳动得日益强烈。“在延安，我见到了1个崭新的中国。”“延安是中国管理得最好的1个城市。在汉口，我所看到的是一片混乱和优柔寡断、昏庸无能的官僚政治的种种令人灰心的现象。而延安的行政部门却表现出有信心和有目的。街上一片蓬勃的气象，来来往往的人们好像都知道自己是为为什么目的而奔忙。”这些印象使他对中国革命、革命的领导者 and 革命的人民不禁又多了一份崇敬。

白求恩到达延安后的第二天，就得到了1个意料之外的好消息，毛泽东要会见他，而且就在当晚。

白求恩盼来了傍晚。红霞满天，映照着重峦叠嶂的凤凰山，映照着重峦叠嶂的延河水。要见见这位神往已久的伟大革命者，是他来中国时的心愿之一，但没有想到这么快就实现了。他控制着激



毛泽东

生·平·全·纪·录

· 国际共产主战士白求恩正在为八路军伤员做手术 ·





动的心情，匆匆地换上刚发给他的八路军灰布军装，仔细地扣好每个扣子，又从带来的皮箱的最底层拿出了1个皮夹，郑重地放在贴胸的衣袋里。

晚上11点，白求恩走进一孔普通的窑洞，和毛泽东见面了。白求恩望着眼前这位魁梧而有些消瘦的人，他虽穿着一身常见的灰布棉衣，袖口和膝盖上打着补丁，脚下是一双八路军战士的棉鞋，但眉宇间透出勃勃英气，眼里闪着坦诚和智慧的光彩。这就是领导中国革命军民创造了许多震惊世界奇迹的人吗？白求恩庄重地向毛泽东主席行了1个西班牙国际纵队的战斗敬礼。

毛泽东打开白求恩递交给他的那个皮夹，那是1个加拿大共产党员的党证。毛泽东感动了，他体会到了这位共产主义战士的一片赤诚。

窑洞里的油灯安静地燃烧着，毛泽东和白求恩热情地谈论着。

毛泽东先向白求恩问起对于西班牙反法西斯战争的看法，接着谈到中国，特别是目前在医疗方面的需要。

白求恩说：“在中国的抗战中，我觉得最能发挥作用的方式是组织战地医疗队，在前线附近工作，照顾重伤员。”

毛泽东沉思着，八路军目前还没有战地医疗队，而且，由于敌人的各种封锁，药品、器械和医务人员极为缺乏。按西方的标准，八路军简直没有什么医疗机构。

“如果没有战地医疗队，重伤员怎么办呢？”白求恩担心地询问。

毛泽东的心情很是沉重，他告诉白求恩：“很不幸，目前重伤员中死亡的人太多了。”毛泽东心想，在许多后方医院，几乎没有头部和腹部受重伤的士兵，这当然不可能是前线没有这样的伤员，而是在转移到后方的路上，伤员就牺牲了。

“但是，他们有很多是能够救活的。”白求恩激动地接上去说。

毛泽东的眼睛热情地注视着白求恩，非常关切地听着。

“根据我在西班牙的经验，只要在前线附近拥有战地医疗队，重伤员中百分之七十五一定可以复原。”

“百分之七十五？”毛泽东的思想一下子好像完全集中在这个数字上。“是啊，从几乎没有，到多数重伤战士能够避免牺牲，这等于我们的战士可以有两次，或更多次的生命以打击敌人。”想到这里，毛泽东更是激动。白求恩则期待着毛泽东的决断。

毛泽东又一次热情地注视着白求恩：“白求恩同志，那就请您立刻组织战地医疗队吧。”

“好！”白求恩爽快地答应着。他的脸上浮现出满意的微笑。

谈起目前的抗战形势，毛泽东分析了中日双方以及中国内部各派力量在这场战争中的地位及表现，他坚定地说：“尽管日本在目前和最近的将来，可能获得一些暂时的军事胜利，但只要坚强地抵抗，中国必将在持久战中取得最后胜利。”

白求恩认真地听着，在昏黄的油灯的光亮中望着这位从容不迫地讲话的人。他想，在这种艰难的条件下，毛泽东却有着这样的坚定和智慧，他相信，挽救中国的一定是这样的人，这样的党。



毛泽东

生·平·全·纪·录

夜是漫长的。毛泽东和白求恩的谈话越来越热烈，他们从国际局势谈到国内政治和军事斗争，从白求恩以前的经历谈到现在面临的工作。白求恩觉得毛泽东实在是一位知识渊博的人物，在他身上各种不同的知识和才能似乎浑然天成，而其谈吐又极为平易近人。甚至他极为关心地向白求恩请教，在冰河的冷水中储存血液的经验。

他们就这样没有间断地谈了3个小时，毛泽东还是像谈话刚开始时一样，精神那么饱满，思维那么敏锐。

毛泽东把白求恩送出窑洞门口，他请白求恩向支持过中国的美国朋友们转致谢意。最后，他又一次握紧了白求恩的手，忽然说：“百分之七十五，是这样吗？”

“至少如此。”白求恩自信地笑了。

毛泽东的脸上也泛起舒心的微笑，目送着白求恩的身影消失在夜色之中。

很快，在敌后的晋察冀根据地、冀中根据地，活跃起一支以1个外国人为首的八路军战地医疗队。在每一次激烈的战斗中都有他们的身影。与此同时，中国人民也知道了1个伟大的、可亲的名字：诺尔曼·白求恩。

在战斗的岁月里，在紧张的工作间歇，白求恩给毛泽东写过许多信。毛泽东也一直关心着这位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视为己任的外国同志。

不幸的是，在白求恩来华的第二个冬天，这位曾帮助无数重伤员战胜死神的人。因为坏血病的侵袭而倒下了。那是在一次为伤员施行急救手术时，他的手指被碎骨划破而受到感染。当时由于日军和蒋介石的封锁，橡皮手套和抗毒药品在根据地是极为缺乏的。

在弥留之际，白求恩为自己在华的工作做了如下总结：

请转告加拿大人民和美国人民，最近两年是我生平中最愉快、最有意义的时日！

白求恩的逝世，毛泽东是很悲痛的。就在白求恩逝世不久，毛泽东在紧张的工作和战斗中，写下了《纪念白求恩》一文。

“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毛泽东向我们每一个人发出学习白求恩的号召。

泰山与鸿毛

1944年9月，秋风吹着满山遍野的金黄色的谷穗沙沙作响，枣园里果树挂满了青油油的肥大果实，把树枝都压得喘不过气来，人们怀着欢乐的心情，庆贺边区大丰收的好年景。不幸得很，在这欢乐的日子里，却传来了噩耗：在安塞执行烧炭任务的张思德同志因窑塌而光荣牺牲了！